

■主编导读

已知的未来

□蔡骏

小时候，我读过的第一本小说是《海底两万里》。在我阅读这本书的年代，尚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两个超级大国的潜艇，仍然游弋在地球上的任何一片海底。任何一方按下按钮，都足以毁灭整个地球不止一遍。对于儒勒·凡尔纳而言，这是名副其实的“未来”，远远超出了19世纪作家们的想象。虽然在《海底两万里》出版的年代，人类已经有了潜艇，当时尚是极度危险的“水下棺材”，曾在南北战争当中损失惨重。本书描述的时代背景，也并非20世纪或21世纪，更像是如今流行的“近未来”故事。但从海水之中提炼钠来发电作为潜艇动力，至今仍未成为一项成熟技术。也许儒勒·凡尔纳对未来唯一实质性的影响，就是人类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海底两万里》在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之前连载，那是法国动荡与革命的年代。十年后，第三共和国正在舔着伤口，儒勒·凡尔纳开始连载《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很遗憾这部作品写的中国人和中国几乎完全走样了，毕竟作者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完全来自二手资料。儒勒·凡尔纳笔下的中国就像某个幻想中的世界，比如主人公金福所定居的半殖民地上海，就像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银翼杀手》中的洛杉矶，呈现出东西合璧光怪陆离的景象。顺便说一声，《银翼杀手》的2019年虽然也是未来，但已近在眼前（本篇导读写于2018年2月）。显然《银翼杀手》的未来实际上还很遥远，儒勒·凡尔纳的未来却已成为了过去时。

还是回到中国，回到上海。晚清上海医生陆士谔，在宣统二年做了个梦，醒来竟是宣统四十三年，西历1951年——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已40年，上海的外国租界早已收回，高楼鳞次栉比，空中翱翔无数飞船，洋人见着中国人无不尊敬有加。万国博览会在繁华如曼哈顿的浦东举行，“把地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跑不绝。”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连到对岸浦东。“中国海军在吴淞口大阅兵，总吨位世界第一，光一等巡洋舰就有五十八艘。黄粱一梦醒后，他写了部幻想小说名为《新中国》——最吊诡的并非是万国博览会与黄浦江上的大铁桥（以上预言，陆士谔全都猜准了，只是迟到了大约半个世纪，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南浦大桥与杨浦大桥，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而是“宣统四十三年”的惊人事。众所周知，宣统是中国最后一个年号。宣统三年便是辛亥革命到清帝退位。袁世凯的“洪宪”可以不算，并未正式实行，宣统皇帝后来做了日本人傀儡的伪满洲皇帝的“康德”年号便更不能算了。换句流行语就是“拉倒吧，朕的大清都亡了”。但写于宣统二年的《新中国》，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个即将发生的未来。作者更不会想到“宣统四十三年”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年，中国军队正在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血战，“宣统皇帝”刚结束在苏联的战犯生涯，回国被关押在旅顺战犯管理所。

宣统二年，已有许多中国人阅读过儒勒·凡尔纳，也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科幻小说家。在他们笔下的未来，大体如此，无不热切盼望工业文明，就像郭沫若的新诗《笔立山头展望》的深情赞美——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船轮，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谁承想在百年之后，“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成为制造雾霾的罪魁祸首，无论中产阶级抑或普通民众都避之唯恐不及。“二十世纪的名花”是否已经凋零？我无从回答。那么我们今日所热衷的新科技“二十一世纪的名花”，是否也会在百年后甚至50年后成为我们所嫌弃的对象呢？

感谢刘慈欣、郝景芳、马亲王、哥舒意等大家为《罗生门·未来》撰稿，在他们的作品前头写导语，其实是最有些小紧张的，就像如今的人类面对未来的小紧张。所以啊，我就借用本书里我的那篇《焚尸年代的爱情》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导读——

你问我，海的那边是什么？我才明白，那是未来。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婴儿是十分脆弱的，小马出生后10分钟就能自己直立行走，而人类的婴儿要在摇篮里待相当长的时间，这期间如果没有外界的悉心照顾，他们不可能生存下去，凭自己的力量，人永远无法走出摇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进化的需要，人的大脑体积较大，充分发育后则难以出生，只有提前生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婴儿都是早产儿。

如果把人类文明的整体看作一个婴儿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早产儿。文明的发展速度远快于自然的进化，人类实际上是用原始人的大脑和身体进入现代文明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没有外界的照顾，人类文明这个婴儿是否也永远无力走出自己的摇篮？

现在看来有这个可能。

在遥远的未来，当人们回顾20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时，这期间发生的所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将被时间磨得平淡无奇，只有两件现在被我们忽视的事情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人类迈出了走出摇篮的第一步；二、人类又收回了迈出的脚步。这两件事的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加加林飞入太空的1961年可能代替耶稣诞生的那一年而成为人类元年，而阿波罗登月后太空探索的衰退，将给人类留下比被逐出伊甸园更惨痛的创伤。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将被当作黄金时代而记忆，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仅三年多，第一名宇航员就进入太空，其后仅七年多，人类就登上了月球。当时，人们被远大的目标所激励，认为再有十年左右人类将登上火星，而抵达木星轨道登上木卫二也不是遥远的事。早在这之前，就诞生了豪气冲天的猎户座计划，用不断爆炸的原子弹驱动飞船，可以一次将几十名宇航员送上外行星。

但很快，阿波罗登月因资金中断，取消了剩下的飞行。以后，人类的太空探索就像一块在地球重力场中抛起的石头，达到顶点短暂停留后急剧下坠。阿波罗十七号最后一次登月的1972年12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后，虽然仍有空间站和航天飞机，有越来越多的各类人造卫星和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飞向地外行星的探测器，但人类太空事业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太空探索的目光由星空转向地面。阿波罗十七号之前的太空飞行是人类走出摇篮的努力，之后则是为了在摇篮中过得更舒适些。太空事业纳入了经济轨道，产出必须大于投入，开拓的豪情代之以商人的精明，人类心中的翅膀折断了。

但这只是印象而已，真实的情况是：要达到人类现有的环境保护的目标，所需的技术比起大规模星际航行要难得多。

在认知层面上，要想保护环境首先要认识它，要从全球尺度上理解它的规律，而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各学科对其细节有了大量的研究和了解，但在全球的整体尺度上，目前人类无论从基础科学还是从应用科学层面上都没有掌握它的规律，对于天气系统的运行、大规模生物群落的变化和相互关系等，人类科学所能知道的都很有限。以全球变暖为例，与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宣传不同，地球气候是否真的在变暖，如果是，变暖是否与人

类活动有关？对这两项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学研究目前都无定论，所以遏制全球变暖更像一项政治运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对地球表面，还不如对月球表面了解得多，可能很快，也不如对火星表面了解的多。

现在，月球重新变成了没有人迹的荒凉世界，俄罗斯和美国的行星载人飞行计划先后变为泡影，欧洲探索太阳系的“曙光计划”也被搁置，看不到一点曙光。在航天飞机退役之后，曾经踏上月球的美国人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失去了把人送上近地轨道的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想到的原因无非是技术和经济两方面。

首先看技术原因：不可否认，人类目前不具备在太阳系内进行大规模太空开发的技术。在太空航行最基本最关键的是推进技术上，人类目前只处于化学推进阶段，而大规模行星际航行则需要核动力推进，目前的技术距此还有相当的距离，核动力的火箭和飞船还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东西。

再看经济原因：以现有的技术，把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耗资相当于同样重量的黄金；而送到月球和其他行星，所需资金则十倍甚至百倍增长，而在太空开发产业化之前，所有这些投入只得到很小的回报，比如阿波罗登月工程耗资26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亿美元，只得到两吨多的月球石块（当然，登月工程的技术成果在其后的民用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但这些效益无法量化，不可能作为决策时考虑的决定性因素）。

由上所述，太空开发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巨大的冒险，把太空看作人类新的家园，把人类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个大冒险上，这在政治上是无法被接受的。以上的理论论据坚实，似乎不可辩驳，也就决定了目前人类的太空政策和其所导致的太空事业的衰落。

但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目前正在全力投入，并将其看作地球文明未来生存的唯一出路的一项宏大的事业：环境保护。

从技术层面上看，太空航行和环保在人们头脑中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剧烈的、高速的和冒险的，意味着尖端高技术；后者则是一种温和的绿色的公益活动，自然有技术在其中，但其难度在印象中与前者相差甚远。

但这只是印象而已，真实的情况是：要达到人类现有的环境保护的目标，所需的技术比起大规模行星际航行要难得多。

在认知层面上，要想保护环境首先要认识它，要从全球尺度上理解它的规律，而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各学科对其细节有了大量的研究和了解，但在全球的整体尺度上，目前人类无论从基础科学还是从应用科学层面上都没有掌握它的规律，对于天气系统的运行、大规模生物群落的变化和相互关系等，人类科学所能知道的都很有限。以全球变暖为例，与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宣传不同，地球气候是否真的在变暖，如果是，变暖是否与人

一个和十万个地球

□刘慈欣

的手笔，所涉及的技术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在科幻中才有的超级技术，其难度远大于太阳系内的行星际航行。

除了技术上的难度，从经济层面上看环境保护，我们发现它与太空开发也十分相似：都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在初期也都没有明显的经济回报。

但人类对环保的投入与对太空开发的投入相比，大得不成比例。以中国为例，“十二五”规划中计划投入环境保护的资金为三万多亿元人民币，但对太空探索，只计划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太阳系中有着巨量的资源，在八大行星上，在小行星带中，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资源，从水到金属到核聚变燃料，应有尽有，按地球可以最终养活1000亿人口计算，那么整个太阳系中的资源总量可以养活十万个地球的人口。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放弃了太空中的十万个地球，只打算在这么一个地球上生存下去，而他们生存的手段是环保，一项与太空开拓同样艰巨同样冒险的事业。

同环保一样，太空开发与技术进步是互动关系，太空开发会促进技术进步，阿波罗工程之前美国并不具备登月需要的技术，相当一部分技术是在工程的进行中开发的。核裂变技术在地球上已成为现实，实现太空核推进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可控核聚变虽然还未实现，但只存在技术障碍而不是理论障碍。

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40多年前登月飞船上的导航和控制计算机，其功能只相当于现在iPhone4的千分之一。太空开拓与已经过去的大航海时代很相似，同样是远航到一片未知的世界，去开拓人类的生存空间，开拓一个更好的生活。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的航行在当时得到了西班牙伊莎贝拉一世女王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是卡斯提亚王国的女王，当时独立的西班牙并不存在），女王自己也难以供起这支船队，据说她把自己的首饰都典当了，然后供给哥伦布远航。现在的事实证明，这是最明智的一笔风险投资，以至于有人说世界历史是从1500年开始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整个世界的全貌。

现在，人类正处在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前夜。我们现在甚至比哥伦布要有利得多，因为哥伦布看不见他要找的新大陆，他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几天之后还没有见到陆地，这个时候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犹豫彷徨，而我们要探测的新世界抬头就能看到，但是现在没有人来出这笔钱。

也许，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人类的个体婴儿一样，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真的永远无法走出摇篮。

但从宇宙角度看，地球文明是没有父母的，人类是宇宙的孤儿，我们真的要好自为之了。

（摘自《罗生门·未来》，蔡骏主编，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撕得越碎，记得越牢

——读庞余亮《有的人》

□陈永光

从前，《有的人》是一首诗。现在，《有的人》是一部长篇小说。

看似妙手偶得，实则其来有自，苦心经营。

在小说《有的人》中，提到了彭三郎的第一次写作。在那首诗（如果能叫做诗的话）中，写下了他对老师的“咬牙切齿”；李文标，我们在织你的脸。不用说，这是对于另外一首诗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直接套用。它像我们现在流行的、某些经典歌曲的落地版本一样，层次不高，原创不够，仅仅出于原始的、自我的，甚至是功利的感情色彩，有时简直近于戏谑了。

和这种简单的互文写作相比，小说《有的人》要复杂得多了。你看，诗歌变成了小说。以“有的人”为关键词，串起了整体的写作提纲。在文本的铺陈中，不仅有“小说”与“诗歌”的互文，还有“彭三郎”、“你”这种人物的变换，还有“彭三郎”、“小P”、“宋建设”这种角色的流转。这使得小说《有的人》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形成了一个连环的互文。又像一座座彼此相连的迷宫，迫使你去寻找、发现那通幽的曲径。

作家庞余亮早已构成了属于自己的互文体系：比如反复提起的庞家庄，比如父亲的形象，比如乡村教师的身份。在诗歌中，在散文中，在小说中。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表情与姿势。似曾相识，相互映照，互相补充。如果说，这种“互文”是一种加法或乘法的话，那么，《有的人》的写作则试图做减法、做除法，在仅仅保留某种语言模型的基础之上，探索更多的心灵空间与现代意味。

诗歌一针见血，小说山重水复。彭三郎的语言课本上，有三首诗：《有的人》《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时代性，但“有的人”这个标题体现了一种不确定性，更含蓄，更多义，更广阔。它既给诗歌的窗户拉上了窗帘，又交给了小说更为高远的梦想天地。很有意味的是，诗歌《有的人》至少在字面上并无确指，但意义是外向的，而小说《有的人》有名有姓，人物众多，在意义上反而是内向的。它是

溯流而上，它是痛定思痛，它是反躬自省。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比如陈皮，比如海子。比如父亲。

海子向死而生，以决绝的姿态，作为殉道者的形象被人仰望。陈皮则当头棒喝，死于意外，可谓惨烈。联系到他独一无二的家庭变故，更是令人唏嘘。在去交学费的路上，外公对陈皮说：别叫我好外公，叫我坏外公，叫我东郭先生，叫我老混蛋。这个世界，对于陈皮，有没有同样的愧疚？！对于诗人，有没有同样的愧疚？！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诗人在物质世界中只是一个偶然，又是精神世界中的一个必然。精神世界无拘无束，物质世界里规则千丝万缕。海子让人无法可说、欲说还休，而陈皮，则让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个诗人炮灭了，在另一个诗人心里燃起了熊熊大火。

陈皮死后，彭三郎为他所做的一切，除了道义使然，同时也来自诗歌的驱动。生命固然免死狐悲，而诗歌精神的跌落尘埃，则是更为广大的人间悲剧。所以，对于彭三郎来说，他的长诗虽然叫做《完成》，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完成。诗人死了，就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等待下文、而又难以接续的破折号。

父亲的亡也像这样一个破折号。母亲让人亲近，父亲则令人疏远。奇怪的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就要立即剪掉和母亲相连的脐带。一岁左右，就要断乳。母亲更多的是生理的、日常的、物质的。父亲呢，他与我们的联系，更多的是心理的、内在的、精神的。我们与父亲，同样连有脐带，同样存在哺乳关系。然而，要剪掉内在的、心理上与父亲相连的脐带，实现精神上、灵魂上的断乳，则要迟缓，神秘得多。也许，这种“剪”与“断”，将持续一个人的一生。

父亲未必能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正如李文标不是一名合格的老师一样），但父亲是离我们最近的老师。父亲帮助我们确立相对独立的自我。总有一天，你会惊觉：原来父亲在暗中曾经给予了我们如此巨大的影响！父亲的

亡，不过是在形式上切掉了父子之间的联系，在儿子幽暗的内心世界里，从此却点上了一盏长明灯。

尽管彭永强的所作所为堪称恶棍，但羞怯的、阴郁的、愤怒的儿子彭三郎还是写下了《父子一场》，并且还获得了大奖。如果说，诗人是另一个自己，那么，父亲则是又一个自己。父亲亡了，自己至少死去一半。半个身体与灵魂，如何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苦延残喘？！

李文标撕碎了课本。衰老和疾病撕碎了父亲。偶然的事故撕碎了陈皮。对于彭三郎来说，有的碎片叫课本，有的碎片叫父亲，有的碎片叫诗人。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父亲和诗人一样，都是我们的人生课本。吊诡的是，撕得越碎，记得越牢。课本、父亲、陈皮，都成为了彭三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暴力、死亡和混乱，它们挡住了本该灿烂的阳光，给生命投下了重重叠叠的阴影。

家庭中的父母。社会上的老师和朋友。我们的成长，离不开这些“挡在前面的人”。孙悟空再狠，唐僧有“紧箍咒”治他。贾宝玉听人一说“老爷来了”，随即拼命奔跑。孙权纵然“神武雄才”，也要“兼仗父兄之烈”。《水浒传》就是一群朋友的故事。在家国情怀的抒写中，我们历来较多地宏大叙事，较少关注细弱的人心，挣扎的人性。《有的人》内求于父，外诉于友，恰恰是这样一种小叙事，甚至是微叙事，在类似美白、反省、沉思的语言和情境之中，将深重的父兄情结绵长、细腻、生动地展示出来。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父兄如同镜子一样，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修改

出果实。我们的内心是荒芜还是繁茂，是枯竭还是丰盈，是冷漠还是温暖，决定于我们必然或偶然遇到的人，经过的事，听到的话，读过的书。每一个微小的空间，每一个琐碎的时间。

当然，每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来自家庭、校园、小社会，更与时代、与大社会紧密关联。海子的死，意味着诗歌帝国的崩塌。陈皮的死，则言说着社会的江湖化。父亲的一言一行，与传统乡村的尾大不掉有关。在社会转型、人心流散、灵魂失重的环境之中，谁能够激浊扬清，独善其身？我们不妨问问：诗意如何栖居，人心如何收拾，乡村如何重塑？《有的人》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展开，它更关心的，是“彭三郎”的自我救赎：在迷乱、沦陷与失败之中，如何走向清明、秩序，重新拾得尊严与信心？

《有的人》结尾写道，彭三郎想得很深很深，又忍不住骂了句：细狗日的。我们不妨再问问：当我们不仅仅是儿子，也已经是父亲，我们如何来做好这样一个人？从父亲开始，又回到父亲。从儿子开始，又回到儿子。人伦永继，我们既站在父兄的肩膀之上，又必然要将自己的肩膀让给子女。每个人既是恒星，又是卫星。世道轮回，“父”的问题、“子”的问题一直在那里。原来，生与死，既是我们共同见证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独自完成的一次互文。诗人的死，父亲的亡，同样贯穿于这条人生主旋律，不过是洪钟大吕，出现了两次逻辑重音而已。

从有的开始，到有的结束。雄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小说《有的人》就像一次折返跑，又像是庞余亮把左手交给右手，独自一人完成的一次接力。他让我们感到，死亡既像一把冰冷的利剑，又像一种温暖的粘合剂。既分离我们，又融合我们。在死者与生者之间纠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困惑，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不管我们写的是诗歌还是小说，都不过是亡羊补牢、退而结网，在寻找一个坚定有力的自己而已！

（《有的人》，庞余亮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